

## 回顾与前瞻

## 关注分化趋势 激发消费需求

□ 李凌

## 编者的话

谋划2019年的经济工作，一项重点任务就是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将市场的潜力激发出来，不断扩大市场规模。具体来看，就是改善消费环境、增强消费能力，努力激发投资需求、切实满足最终需求。对此，一方面，要密切关注2018年消费领域的发展变化，深入分析其短期态势和长期趋势；另一方面，要冷静研判2019年面对的机遇和挑战，找到激发消费需求、提振消费市场的正确路径。

提振消费是增强居民幸福感、获得感的有效途径。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9853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

6.2%，同比增加0.8个百分点，略低于6.5%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从全年消费变化看，前三个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分别增长5.4%、6.7%、6.3%，同比变化为-0.8个、0.6个、0.4个百分点，消费支出增速整体上走出了2017年末的低点。

## 2018年：居民消费分化初露端倪

2018年初，随着“新零售”“数字经济”“数字贸易”等一系列新概念涌现，消费领域的新动能蓄势待发。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升，消费升级牵引产业结构升级，带动消费产品和服务朝着“品牌、品质、品味”的方向发展，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尤其是在互联网经济的催化下，平台经济、分享经济、网红经济等催发了商业生态变革与消费理念变化，高品质、个性化需求不断涌现，消费升级趋势明显。与此同时，中美经贸摩擦一波三折，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人们对消费支出表现得更加谨慎。应该看到，这是2018年我国居民消费嬗变的一个侧面，也是转型经济体消费分层、消费分化的主要表现。其中，与以往发展经验截然不同的消费分化趋势值得关注。

一是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增速的分化。从以往的发展经验看，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速大致在年均7%至8%的区间内波动，两者基本保持同步，而且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率略高于城镇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率。值得关注的是，2018年的城乡数据显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2124元，实际增长8.4%，城镇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6112元，实际增长仅为4.6%，两者相差3.8个百分点。这是继2012年第四季度实施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以来，城乡消费支出增长差异较大的一年。城乡居民消费增长分化的背后，是农村消费水平的赶超和城乡消费水平的趋同，农村消费市场被激活，农村消费需求井喷增长。

二是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人均消费增速的分化。从以往的发展经验看，东部沿海地区人均消费实际增速大约在年均7%至8%之间，中西部地区的人均消费实际增速大约在年均6%至7%之间。但从2018年人均消费支出的空间特征看，中西部地区增速明显高于东部沿海地区，反映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上亦是如此。2018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8万亿元，同比增长9.0%，从已公布的1月至11月累计数据看，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陕西等地区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地区居民消费增速分化的背后，是中西部消费水平的赶超和地区之间消费水平的趋同，而且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和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中西部地区的人均消费支出增速将继续保

持较好增长势头。

三是发展改善型消费与基本保障型消费之间的分化。从消费结构看，以食品烟酒和衣着支出为代表的消费保障型消费支出份额进一步下降，两者的占比从2017年的36.1%下降到2018年的34.9%，减少的份额被居住和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吸收。从消费各项内容的增速变动看，2018年增长最快的也是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增长16.1%，其次是居住和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分别增长13.1%和9.1%。相比之下，衣着和食品烟酒消费支出的增速垫底，只有4.1%和4.8%。另外，在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方面，无论是增速和占比，2018年都有所下降，表明居民消费升级的能力和方向可能仍较多地受到住房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牵制。

此外，具体到线上消费，大商家与小商家之间的经营业绩也出现分化。有大数据分析显示，在线消费支出有向大商家集中的趋势，原因可能是大商家更愿意加大成本投入来提升消费者的消费体验和产品质量。由此可见，在消费升级的牵引下，在线消费市场正在逐步摆脱“低价取胜”的阶段。

## 2019年：提振消费重在以人为本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做好经济工作至关重要。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努力满足最终需求，提升产品质量，加快教育、育幼、养老、医疗、文化、旅游等服务业发展，改善消费环境，落实好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增强消费能力，让老百姓吃得放心、穿得称心、用得舒心。这为2019年更好激发消费需求、提振消费市场指明了方向。

研判2019年的消费发展趋势，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从消费结构和消费内容看，基本保障型消费支出占比将进一步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个性化消费、品牌化消费、互联网消费、服务消费提速，尤其是赛事、文化、健康、旅游、物流等领域的消费，将成为消费新的增长点。消费内容升级则需要充分释放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牵引作用，加快教育、育幼、养老、医疗、文化、旅游等服务业发展，激发潜在消费，补齐供给短板，引导理性消费，更好促进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

从居民消费的空间结构看，趋同和分

化的力量将持续并存。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有示范效应，东部沿海地区的消费支出对中西部地区的消费支出有示范效应，由此产生缩小城乡和地区消费差距的内生力量。与此同时，随着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不断完善，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增长将高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增长，中西部地区人均消费增长将高于东部沿海地区人均消费增长，由此产生了与以往不同的发展景象。

从释放消费潜力的政策支持看，随着收入的增长，一次分配中可支配收入对消费的影响程度将逐渐下降，二次分配即广义收入对消费的影响程度将逐渐上升，其中包含税收和社会保障等因素。2019年《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规定，纳税人可享受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专项附加扣除，从而进一步从政策支持角度刺激消费。

从技术进步和消费联动看，加快5G的商用步伐将对消费的内容和形式产生重大变化。2018年12月，三大基础电信运营商均已获准开展5G系统试验，在

2019年有望实现5G网络商用，正式商用也已指日可待。可以预见，在新零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领域，新的消费需求将不断涌现。

此外，不断改善的消费环境，以及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相关举措，都将对提振消费产生积极作用。比如，2019年起实行的《电子商务法》将给消费者带来更多权益保障，主要包括平台不得删除评价，误导消费者；制约“大数据杀熟”，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禁止“默认勾选”；等等。都有助于形成推动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

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必须将有效激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与化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结合起来，与推动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结合起来，与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为此，必须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出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人为本，重视人的需求，更好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副主任）

## 撷英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刘世锦——

## 重构适应高质量发展的

## 地方竞争机制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办法或模式从哪里来？顶层设计是重要的，主要是“指方向、划底线”，说清楚大的方向、目标，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样的局面要避免。在此前提下，具体什么样的办法符合各地的实际、能够有效推动不同地区的高质量发展，不是能够事先计划好的，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而是要靠在市场的探索、试错、比较、竞争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强调的是地方之间经济竞争的重要性。

地方竞争机制被认为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央和地方之间一直存在着“统”和“放”的循环与争议。当市场经济大潮涌来，政府的角色逐步演变，如果说企业家是生产要素的组合者，那么地方政府则是生产要素平台的搭建者。大量事例表明，地方政府的作为确实能够提升这一地方的发展水平。

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套地方竞争机制仍然有效，但需要与时俱进地改革、创新与提升。与高速增长阶段相比，地方竞争的内容将有所调整，应主要包括：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营商环境的竞争；培育创新环境、聚集创新资源、成为区域创新中心和创新型城市的竞争；吸引中高级生产要素、形成不同类型劳动者合理分工结构的竞争；以人民为中心、创造性、包容性、稳定性内在一致的社会治理方式的竞争；等等。

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建设大都市圈、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基地等促进经济增长的机会将层出不穷，但谁能抓住并利用好这些机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竞争优势。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既要支持保护企业层面的企业家精神，也要倡导保护地方政府的创新精神。在大方向明确的前提下，应允许地方在合理范围内进行试错，在竞争中发现和推广好的做法、模式和政策。

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张建平——

## 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

## 开放新格局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国需要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进而有效推动国内各项改革进程，找到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的合理方案。

全方位，意味着我国要向全世界扩大开放。在全球化时代，继续深入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是构筑全球价值链体系、发挥各国比较优势的重要途径。要坚定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区域合作进程，特别是用好“一带一路”这样的国际合作平台。同时，我们开展多种形式的区域合作和次区域合作，也是要面向四面八方向时开放。

多层次，意味着我国的开放既有多边合作框架下的开放、诸边层面上的合作开放，也要有双边合作进程中的开放。在多边层面上，我们要坚定维护世界多边贸易体系，维护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框架体系和争端解决机制，同时也致力于推动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进程。

宽领域，意味着我国和所有合作伙伴在开放合作的进程中，将跨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安全等诸多领域，涵盖政策对话、战略与规划对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人文交流、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全面的产能合作与对接，并且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绿色全球价值链的构建。

新时代的改革开放，我国必须要切换到以制度型为导向的全面开放，才能逐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这意味着我国要积极地参与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的构建，在这些谈判的进程当中，中国的规则和世界的规则要进行对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许召元——

## 如何理解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对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目前还没有准确的定义，但根据国内外的经验，可以认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要求：

第一，产品质量不断提高，能够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产品质量提高，包括性能、寿命、安全性、可靠性、经济性和外观等各个方面的不断改善。具体来看，制造品质不断提高，一方面要求各种产品的质量标准不断提高，在有些领域可以达到甚至超过、引领世界先进水平；另一方面，有了标准，产品的检查合格率应该提升，假冒伪劣商品应该越来越少，市场上的商品都是安全可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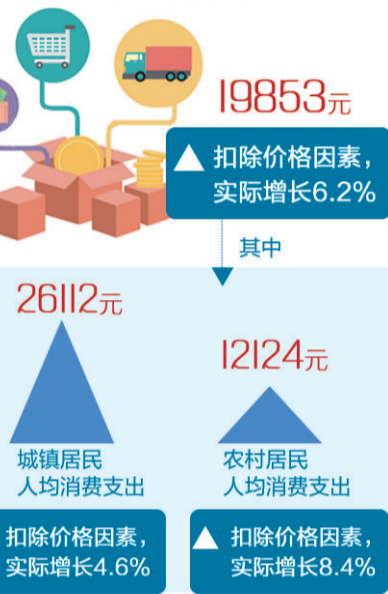
第二，生产过程清洁高效，满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绿色制造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要求。要建设美丽中国，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核心是要求制造业的生产过程更加清洁，更加环境友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还要求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技术进步的过程，就是要能够用更少的投入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提高生产效率，不仅是指劳动生产率的不提高，生产中使用的更少的劳动力，还包括物料生产率的不断提高，生产同样的产品消耗的原材料越来越少。

第三，企业效益保持在较好水平，人均增加值不断提升。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体现为较好的企业效益。企业效益好，需要企业自身能力、产业结构和营商环境多方面的优化，形成合力。从产业结构看，每个行业都应当有合适的竞争水平，不能陷入垄断，损害上下游和消费者的利益，也不能竞争过于激烈，特别是陷入低水平同质化竞争，所有的企业都在低效益状态下运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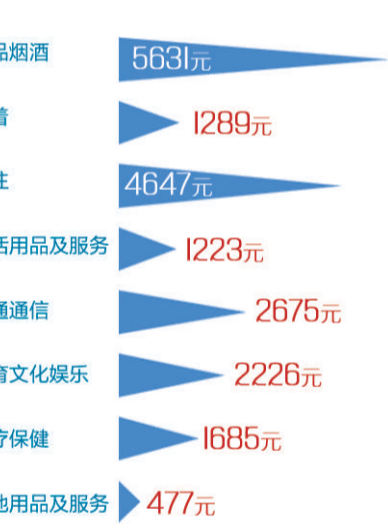
第四，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当前，我国处在一个高度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制造业不可能只立足于满足国内需求，各国产品都需要参与全球竞争。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保持稳定甚至提升，特别是中高技术产品的市场保持份额稳定，甚至提升。

（肖伟）

## 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 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 吸收外资：培育综合竞争新优势

□ 郝红梅

## 观察家说

吸收外资是国际间的经济活动，世界大变局、大趋势会对国际资本流动产生较大影响，我国吸收并利用外资的进程也受世界大环境的推动或者制约。实现更好吸收和利用外资，就必须根据国际国内大局确定外资战略定位，及时进行政策调整。

外部环境是我们难以控制的一个变量，今后一段时期，其带来的不利影响值得关注。

一方面，外资增长空间将继续受国际投资格局变化的制约。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新变化体现在多边贸易机制推进缓慢、国际经贸规则加速重构、全球产业链深度调整、国际竞争态势更趋激烈等诸多方面。在国际投资领域，投资保护性规则的影响增大，近年来增加投资限制措施和行政程序的势头持续存在，主要投资国国内政策的调整成为影响跨国投资流向的主要力量。特别是美国投资保护主义政策逐步落实，不但从税制改革等方面限制企业对外投资，而且还通过大幅减税等措施，对国际资本形成吸纳效应。这些政策都会对其他国家的投资产生冲击。我国“成本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外商投资受到了来自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双向挤压，高度关注美国新政对全球投资可能产生的冲击，以及周边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外资政策调整，

是当前需要做好的一项重要工作。

另一方面，经济增速相对放缓降低了中国市场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目前，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资本回报率有所回落，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传统引资要素竞争优势在减弱，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尚未形成。投资者对经济增长和金融风险等问题的担忧，降低了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

此外，制度性因素对外商投资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我国的外商投资环境在市场准入、市场竞争、法律政策、政府管理服务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短板，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玻璃门”“弹簧门”等问题仍较突出。应该看到，我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时期以及居民消费结构的快速升级时期。无论是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还是在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方面，还是在提升服务业现代化水平，还是在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外商都有巨大的投资机遇。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依靠低成本优势支撑外商投资快速增长的情况难再出现，我们只有具备更多吸收外资新优势，加快从成本优势向以人才、资本、技术、服务、品牌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转变，在投资环境建设上领先于其他新兴经济体，才能对国际优质资本产生足够的吸引力，更好吸收和利用外资。

一是培育全方位开放的新优势。目前，我国全面开放的条件环境基本具备。下一步，要加快实施更加积极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促进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开放，助推内陆沿边地区成为开放前沿，形成海陆统筹、东西南北兼顾的开放新格局。在制造业领域，我们比以往更需要与国外企业在研发、技术、资本和人才等更广泛的领域开展深度合作，下一步需更好扩大高技术制造业的开放领域，制定并完善相关标准体系建设；在服务业领域，要更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和高品质转变，进一步扩大金融、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服务业市场的对外开放。

二是培育产业综合竞争的新优势。应抓住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交汇的重大机遇，发展特色外向型产业集群和产业基地，继续推动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产业集群发展，充分发挥地方比较优势，立足当地基础产业、资源、劳动力等优势，支持地方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与培育。

三是构建对外开放平台的新优势。有产业特色和配套产业基础的大型开发区、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是我国承接全球产业链转移的主要载体，也是局部降低交易成本、改善营商环境的有效载体。要加快提升各类开放平台的水平，推动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转型，推进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统筹推进1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从国家

层面加强对自贸试验区的战略谋划，赋予其更大改革自主权，推动改革创新措施的切实落地，充分发挥其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示范带动作用。同时还要加快对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的研究。

四是打造营商环境的新优势。优化营商环境并非等同于简单的市场开放，它包括整个投资环境的改善，包括经济环境、政策环境、社会环境。要更加系统地研判我国投资环境，将外资企业的感受作为提升营商环境改革效果的一个检验标准，以系统性的制度开放促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创造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制度环境。目前，地方及部门的一些内部文件还在起作用，且缺乏透明度和统一性，对此，要积极对接国际先进理念和通行规则，建立更加开放透明规范的外资准入、监管、服务框架，增强各类企业长期投资中国的信心；要让各类政策切实落地，围绕制度创新这一核心任务，在投资监管、商事登记、金融开放创新、事中事后监管等领域进行系统性制度改革，优化市场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降低显性门槛的同时减少隐性障碍，打通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一个总的判断是，现在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吸收外商投资依然面临严峻挑战，总体将维持低速波动的增长格局。在我国原有的比较优势逐步减弱的时候，也有很多新的优势出现并逐步加强。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主任）